

南风研讨系列

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

主编 郑培凯 李磷

南风研讨系列

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

文化古迹与集体记忆研讨会论文集（2007）

郑培凯 李磷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古迹与集体记忆研讨会论

文集：2007 / 郑培凯，李磷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495-5289-4

I. ①文… II. ①郑… ②李… III. ①文化遗产—保护—中国—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500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270mm 1/32

印张：7.25 字数：206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集体记忆的吊诡

郑培凯

人类之有别于其他物种，自夸为万物之灵，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类能够借助文化工具与载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生经验与发明创造，累积聪明才智，让后人可以吸取精华，创造更先进、更美好的文明。文明累积，靠的是群策群力，承先启后，是尊重前人的努力，期盼后人的承担。

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特别重视文明的承继与传衍，在创造文明真善美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谦逊。牛顿有句名言，是大家时常征引的：“假如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类似的话语，在十二世纪就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说过：“我们就像是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更多更远，并不是因为我们视觉敏锐，或是天生异禀；只因为他们巨大的身躯抬高了我们。”更早一些，有唐朝的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说：“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明确指出，任何伟大光辉而能传世不朽的成就，

都靠的是文明得以传承，通过世代代的集体记忆，才得以彰显。这种对历代集体创造与记忆的推崇，到了宋代新儒家的心中，就扩大成为超越真理的追求，推展了人类生存的目的，出现“民胞物与”的伟大胸怀，凝聚在张载的四句名言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过去最重要的文明载体是语言文字，最重视的是文献记载。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过去对文明历程的认识，对知识的传递，对真理的探求，对学术的发展，基本上靠的是前人的文献著作。我们所说的集体记忆，在过去主要是仰仗文字载体，通过前人话语的记述与复诵，让后人形成文化与世界观的共识。然而，单单通过文字载体，文明的传承会出现选择性的偏差（且不说战乱兵燹、焚书坑儒造成的文献丢失与扭曲），这也使孔子感叹“文献不足征”。更因为上层精英掌握文字书写的能力，依靠文献的集体记忆也会倾向于上层精英的共识，出现阶级性的文化倾斜。

我在《口传心授与文化遗产》（2006）一书中提出，文化遗产的载体有三类：（一）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二）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三）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只有扩大眼界，拓展学术认知领域，包涵了这三类不同文化载体，我们才能趋近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深刻了解集体记忆的多重面向。从这个意义而言，文物古迹的保存与研究，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手段，也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证据。二十世纪考古学的成就以及文物艺术的研究，使我们清楚理解，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具体经历知道得不足，而过去的历史叙述与集体记忆都存在相当的偏差。

然而，现代社会过度强调进步与发展，以经济为主轴，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经常以掠夺与破坏文物古迹的方式，兴盖污染环境的工厂、建设高楼大厦的屋邨，有意识地铲除前人留下的古迹，泯灭理解文明发展

的实物证据，是可忍孰不可忍？人类的集体记忆，是模糊暧昧而且十分吊诡的文化现象，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东飘西荡的游魂。没有历史文献为基础，没有文物古迹作为砥柱，集体记忆只能随波逐流，不知所之。因此，研究文物古迹的保存，探讨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的冲突与平衡，不仅是学术的创新领域，也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反省。

通过文物古迹作为文化载体，研究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文化旅游、民众参与等等具体的社会政治运作，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现代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生活环境的爱惜、对人类处境的展望。因此，学者们或有不同的意见，但集思广益，最终能提供仔细调查研究的资料与成果，贡献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应当有助于学术研究与文化关怀的深化。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这个领域，是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还有待大家去发掘与拓展。作为序言的结语，让我再引一段牛顿的话，与大家共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觉得，不过就像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一块更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却没注意浩瀚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眼前，有待发现。”

序 言

李 磷

一

文化古迹，原是一个含义很丰富、很广泛的常用词，但作为本书的主题，它特指一切与建筑有关的历史遗物，包括城市、村镇、各种类型的建筑物以及园林等。这些历史遗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名称是“有形文化遗产”，而大众传媒近来则喜欢套用一个在西方学界颇流行的理论术语，曰“集体记忆”。收入本书中的文章，既有论及古迹背后的文化价值和集体记忆，也有探讨当前古迹保育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更有实践案例的总结与分析，使读者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去了解这一愈来愈受到社会重视的领域。

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一些过去的事物被有意无意地保存下来，成

为珍贵的“历史见证”，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其价值绝对不可以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常被称为“国宝”。与此相关的中文词语有：古董/古物/古迹，古建筑/古城镇/古村落，遗物/遗址/遗产，文物/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集体记忆，维护/保护/保育，活化，维修/重修……而这方面常见的英文词语有：antiquities, relics, monuments, landmarks, historic buildings/cities/towns/districts, ruins,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preservation/con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renovation/restoration……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评定“世界文化遗产”（World Heritage）机制确立了一系列的指引，故我们现在较多使用“文化遗产”一词。

文化遗产的保育工作，一般有四个环节：考查、评定、维护、利用。而主管这些工作的，通常是政府的法定机构。

三

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设有各级“文物局”；香港特区政府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设古物古迹咨询委员会及古物古迹办事处；澳门特区政府在文化局下设文化财产厅。

至2008年，内地现有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批共2348项，历史文化名城105座；香港现有法定古迹82项；澳门已评定的文物共103项（包括纪念物、具艺术价值的建筑物、建筑群和地点）。

学术研究及专业人士培养方面，内地以往集中在大学的考古专业和建筑系里的古建筑专业，近年规划院系亦不断发展历史城区保育的课程。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就于2003年开办了内地首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本科专业。香港大学建筑系则于2000年开设了“建筑文物保护”硕士课程。

四

欧美国家传统上赋予城市与建筑崇高的社会及文化地位，所以他们很早就着手遗产保育、立法和知识系统化。以我熟识的纽约市为例，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维护研究院”（GSAPP）四十多年前就办起了“历史维护”（Historic Preservation）专业。历史维护不是孤立的，无论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均需要考虑维护当地的遗产。纽约市于1965年对古迹（landmarks）立法并设有法定机构“古迹维护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ttee）。根据法律，委员会由11位委员构成，其中最少有3名是建筑师，另有1名历史学家、1名城市规划师或景观设计师、1名地产行业代表以及5名分别来自纽约市5个不同行政区（borough）的居民，这样的结构可以充分反映专家、业界和居民的意见。纽约市的古迹维护策略，不仅评定历史建筑物（historic buildings），更以评定历史街区（historic districts）为主要手段，即不但注重“点”的保护，而且更注重“面”的保护，全市现有历史街区达83处。纽约市的法律规定，古迹受绝对保护，不得破坏（但内部可进行适当的改造），至于所有触及地面的建设（in-ground construction）项目，均需事先进行考古评估（archeological review^[1]），如建设项目附近有古迹存在，其规划设计必须有结合历史资源（historic resource）并求取和谐的方案。在古迹保育方面，相对于欧洲各地，纽约市做得算不上最精细，有些项目亦曾引起社会强烈争议，但它能够在发展经济与保护遗产之间取得平衡，特别善于活化利用古迹，而且多由民间力量推动，创意出色，例如从前的苏豪区（SoHo）保育以及今天的世贸中心遗址（WTC Site）重建计划，值得我们借鉴。

[1] 纽约市的建设项目审批程序，考古评估属于环境评估（environmental review）中的一个环节。

五

本书为于2007年6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由“形势与挑战”,“集体记忆”,“调查与分析”,“实践与反思”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阮仪三、丁枫介绍了中国城市遗产保护的现状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他们认为,目前影响这一事业进步的障碍是法规不健全及税收制度不合理,各地虽正在探索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双赢之路,但商业利益仍占主导,非营利运作的比率尚很低。李军以古都北京为例,谈到我们是如何继承城市遗产和开拓城市未来的。明清两代的北京以天坛—前门—紫禁城—景山—钟鼓楼为城市主轴线,这是人所共知的皇权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前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修筑了一条宽阔的、东西走向的长安街,并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造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与历史革命博物馆,用新的“社会主义”东西轴线取代了旧的“封建”南北轴线,当然城墙也拆了;现在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在城北建起了以“鸟巢”为主馆的奥运村,与人民大会堂旁的新国家歌剧院“银蛋”遥相呼应,几乎是旧南北主轴线的延续。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北京新南北轴线代表“国际化”(鸟巢与银蛋均由外国建筑师设计),那么它回归“南北”方向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回归中国文化?相对于北京政治先行的做法,香港明显是经济挂帅了。龙炳颐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实际上香港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土地经济问题。在香港,文物保护要取得成功,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地产商合作。”因此他反复强调的是,要端正遗产保育的价值观,经济考虑不能喧宾夺主,“凌驾于古迹保护与诠释的标准之上”。至于是哪些标准?国际社会的宣言、文告、宪章和决议上面有清楚的定义,我们的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可以积极参考,这也叫“与国际接轨”。国际社会在城市规划以及古迹保护领域,愈来愈普遍实施引入公众参与的机制,例如纽约市政府自1951年始已在全市逐步推行“社区委员会”

(Community Boards) 制, 社区委员会虽不是决策部门, 但任何建设项目若未能获得所在地社区委员会的推荐, 最终被市规划委员会否决的可能性极高。毕竟, 社区居民才是项目所在地的主人, 他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该等权利及意见亦理所当然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采用。叶国强、薛求理系统地归纳了香港在五个不同时期公众参与政府规划和文物保护决策的五种不同程度, 让我们感到香港市民的自觉意识正不断加强, 反观政府在思维开放及作业透明度方面, 就要急起直追了。

第二部分: 如果一个名词被滥用, 那就说明它已代表了一种社会现象, 并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或关注。近期在香港, 被滥用的名词是“集体记忆”, 原因是天星码头事件。何培斌、何心怡的文章, 为我们理清了“集体记忆”一词的来龙去脉, 并提出作为集体记忆载体的建筑物, 不一定专指古迹, 也可以是新建筑物, 例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德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等。他们更强调集体记忆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 它有一个被诠释的过程, 因此香港人应该对集体记忆是什么有共识。确实, 不同人对集体记忆有不同的解译。我最早接触此语, 是读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的著作《城市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罗西在书中专门有一节讨论集体记忆 (The Collective Memory), 他指出: “城市自身可以说是她的民众的集体记忆, 她亦如同记忆一般, 紧系着体物与场所。”^[1]他还说: “历史的价值被视为集体记忆, 被视为集体与其场所的关系, 如此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城市结构的意义、个性以及此个性的形式——建筑。”^[2]根据罗西的理论, 无论是作为苏州文人历史文化记忆的园林 (参阅周峥的论文), 还是作为中西文化和睦共存的澳门历史城区 (参阅刘羨冰的论文),

[1] One can say that the city itself i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its people, and like memory it is associated with objects and places.

[2] The value of history seen as collective memory,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llective to its place, is that it helps us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rban structure, its individuality, and its architecture which is the form of this individuality.

两者均是个性化的建筑形式，也是城市结构的意义和个性。因此私家园林与城区历史肌理，分别成为苏州及澳门民众的集体记忆。说起澳门，她在整理文化遗产工作上，有些做法别开生面，例如杨开荆介绍的“澳门记忆”工程，将澳门民众的集体记忆数码化，并上载于互联网，使之成为公开的活档案。我们都明白建立数据库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

第三部分：古迹保育既是一门科学，亦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不仅涉及专业技术知识，而且需要兼顾历史、文化、艺术、政治、宗教、经济、环境等各种社会价值，又要平衡公众利益，故不能照本宣科，一成不变。这就要求对文化遗产作全面、深入的调查以及客观、公正的分析，让事实胜于雄辩。陆元鼎、廖志将目光投向南方农村，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意见。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广阔，农民人口众多。但过去我们的古迹保育工作重点长期集中在城市范围，而忽略了乡村地区。现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迅速城镇化，例如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空心村”和“城中村”，保护传统乡土文化成了当务之急，且农村物业产权有特殊性，在规划中应全面保障农民的权益。陆元鼎的报告指出在村镇发展中引入外来开发商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与阮仪三认为城市遗产保育利用市场资金取得试验成功（以上海新天地和苏州河仓库区项目为例），形成鲜明对比。园林遗产方面，过往研究多偏重横向分类，例如已被广泛采用的皇家园林、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岭南园林等以地方风格为方法论。李磷对近代岭南园林精神的探讨，则属于纵向的分析，以近代社会作为思考背景。刘先觉走得更远，他调查新加坡的佛教建筑，归纳了中国传统建筑在海外的传播及转变。其主旨表面上是关于地域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暗藏了现代社会如何从形式到概念主动继承和发扬前人遗产的讨论。

第四部分：实践个案探讨的具体问题，包括经营管理世界文化遗产、古迹重建项目以及活化利用历史建筑。陆宏仁谈苏州园林的可持续发展，常青谈重建西藏日喀则桑珠孜宗堡，薛求理、叶国强谈香港五个文物建筑的利用。他们的主题虽各不一样，但相同之处是所有的案例都非常注重古

迹保护原则的“真实性”，在建筑、园林修复工作上都做到一丝不苟的严谨。由此可见古迹保护的技术难题我们是可克服的，而保护下来以后如何合理加以利用，才是真正的挑战。例如园林，古代是私人的生活空间，现在苏州的古典园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被政府精心保护起来，开放给游客观光，变为收费公园。西藏桑珠孜宗堡原来具有宗教、行政、居住等功能，重建项目则将内部空间定位为“多功能文化综合体”。香港的兵房变博物馆，商人住宅变孙中山纪念馆，学校变退休特首办公室，雷生春店铺与石硤尾公屋美荷楼尚“名花无主”。其实，所谓“活化”，字面意思是让古迹获得足以继续存在的生命力或融入现实生活中去发挥社会作用，本质是构思古迹使用功能的问题。而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是与时并进、无法预知的，总不能都千篇一律由政府以公帑支付、改做博物馆吧！国外的经验，除具重要纪念意义的古迹由政府参与外，其余一般交付民间组织经营管理，如此既可与市场接轨，自负盈亏（当然有古迹保护专用基金在背后支持），古迹的利用亦可由当前社会的真实需求决定，一举两得，不亦乐乎。

六

综合以上各位作者的论述，我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古迹保护事业极需民间组织及公众参与；

（二）古迹保护手段需从发展旅游观光之类的消费层次，提升至建构当地社会集体记忆的高度；

（三）古迹保护重点应更多地投放在农村；

（四）古迹保护工作的真正挑战，在于活化利用阶段。

这四点，就当作是我们召开研讨会的成果吧。

写于 2008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城市遗产保护和民间力量的成长（阮仪三、丁枫） / 1

- 一 我国城市遗产保护的状况 / 1
- 二 城市遗产保护民间力量的成长 / 4

北京视觉文化发展战略：如何迎接奥运会的机遇？（李军） / 7

- 一 什么是奥运精神？ / 7
- 二 赛场外的奥运：观看文化的视觉形象 / 9
- 三 文化产业、文化战略与布尔迪厄的理论 / 11
- 四 文化战略：北京如何塑造她的视觉文化形象？ / 17
- 五 五个看点 / 22

面对城市急剧发展，如何管理有形文化遗产保育？（龙炳颐） / 29

前言 / 29

- 一 香港情况是否独特？ / 30
- 二 政府的拖延政策是问题的核心 / 31
- 三 文物保护的重点 / 31
- 四 文物保护的经营概念 / 35
- 总结 / 36

遗产保护和公众参与（叶国强、薛求理） / 38

前言 / 38

- 一 背景 / 39
- 二 公众参与的观念和形式 / 42
- 三 遗产保护的评估、保护方式、策略和挑战 / 48
- 四 公众参与的保育例子和过程 / 51
- 五 未来方向及结论 / 51

集体记忆的建构：

建筑中的记忆，记忆中的建筑（何培斌、何心怡） / 55

前言 / 55

- 一 集体记忆是什么 / 56
 - 二 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重塑 / 58
 - 三 集体记忆的意义 / 62
- 结论 / 69

历史的记忆精华：苏州古典园林（周崢） / 71

- 一 苏州园林的起源和发展 / 71
- 二 苏州古典园林的本质特点及艺术个性 / 87

“澳门历史城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象征（刘美冰） / 96

- 一 两大特定的历史条件 / 97
 - 二 四百年间中葡双方政策的调整 / 98
 - 三 澳门内部的因素的潜移默化 / 102
 - 四 要推介外在的奇美，更应弘扬内在的价值 / 105
- 结论 / 105

“澳门记忆”工程——以科技传承文化（杨开荆） / 107

前言 / 107

- 一 “澳门记忆”工程的重要意义 / 108
- 二 “澳门记忆”网站系统结构 / 109
- 三 澳门文献资源电子化规划 / 111
- 四 “澳门记忆”工程相关工作的开展 / 116
- 五 “澳门记忆”工程的长效发展 / 117

结语 / 119

我国南方村镇民居保护与发展探索（陆元鼎、廖志） / 121

- 一 我国南方村镇、民居建筑现状 / 121
- 二 南方村镇、民居的保护与发展概况 / 123
- 三 传统村镇民居保护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 125
- 四 正确理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 129

近代岭南庭园分析（李磷） / 130

前言 / 130

- 一 近代与近代建筑 / 131
- 二 岭南庭园概况 / 134
- 三 近代岭南庭园分析 / 137

结语 / 149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刘先觉） / 151

- 一 概况 / 151
- 二 新加坡佛教建筑的形成与特征 / 153
- 三 新加坡佛教建筑的传统与现代化 / 162

结语 / 166

认识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之路（陆宏仁） / 168

- 一 世界遗产保护的成就回顾 / 170
- 二 苏州园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后思路 / 175

重建“小布达拉”（常青） / 180

- 一 概述 / 180
- 二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设计 / 182
- 三 空间布局与形体设计 / 183
- 四 装饰设计 / 188

活化利用历史建筑：香港近年案例分析（薛求理、叶国强） / 189

前言 / 189

- 一 文物探知博物馆，原九龙公园兵房 / 191
- 二 中山纪念馆，原“甘棠第” / 196
- 三 退休特首办，原英童学校，坚尼地街 28 号 / 200
- 四 雷生春 / 200
- 五 石硤尾第一批公共屋村 / 205
- 结论 / 213